

郑文焯“慢曲宋四家”词说*

杨柏岭

内容提要 清末民初词家郑文焯、陈锐等人论词推崇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四家词。郑文焯词学与其对四家词籍的批校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其学词入手即爱姜夔词之骚雅，继而悟周邦彦词之高妙，针对词家多讥刺柳永词的现象而发明柳永词义为北宋正宗，认为吴文英词具有用隽上之才别具一格的价值。此宋四家词不仅在郑文焯词学思想构建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彰显其崇“体、裁”、尊“风义”、尚“直寻”的批评准则，而且以称词体为标准，重塑传统词学史观念中的“正变”范式，呈现出一定的词学反思意识。

关键词 郑文焯 宋四家 词学 词学史

时至清末民初，词学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批词学大家。与王鹏运、朱祖谋较少论词有别，与况周颐、王国维撰述《词话》构建词学理论体系不同，“清季四大词人”之一郑文焯（以下简称“大鹤”）亦善批评，论词文献极为丰富，然多散见于词籍批校语、书札、序跋之中，其论词体系不甚分明，也影响了后人对他的研究。十余年前，孙克强、杨传庆辑校而成《大鹤山人词话》，杨传庆等更是对大鹤词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其他研究者亦关注过大鹤词的音律论、清空寄托说以及关于柳永、姜夔等名家的词评。不过，论者多习惯于从大鹤融合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角度分析他的词学追求，而对他融合之中且有反思，试图开径自行的研究路径重视不够。其中，大鹤在宋词名家论的基础上，以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四家（以下简称“宋四家”）为骨架的学习慢曲的门径观，即得到过“湘西三才子”之一陈锐以及稍后的蔡桢、陈匪石等词学家的延续与发展，却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兹以大鹤词学为主予以申述，以揭示出清末民初词坛另一个“宋四家”词说的现象^①。

一 大鹤等人宋四家词说的提出及相关问题

大鹤屡屡将柳永、周邦彦、姜夔、吴文英四家并称，例如他曾致信朱祖谋云“周、柳、姜、吴为两宋词坛巨子，来哲之楷素，乐祖之渊源”，既揭示“宋四家”的词史地位，且明言视其为“楷素”“渊源”的门径意识；继而坦言平生专力于此四家词之校勘，要求“今之学者，当用力于此四家”，并提出了具体的学习程序“熟读深思，选某名章迥句，反复索其来历，求其工力于实灵。先学其对仗之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乾嘉以降词史演进的文化学考察”（项目编号12BZW055）阶段性成果。

^① 词学史上“四家说”较多，如李清照《词论》说“始能知”词“别是一家”者为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四家；陆行直《词旨》撮《词源》之要义，概述张炎论词要诀，即“周清真之典丽，姜白石之骚雅，史梅溪之句法，吴梦窗之字面”（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01—302页）。而清中后期周济鉴于两宋词优劣论争的背景，提炼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43页）的词学门径影响最大。今人施议对亦提出“由屯田之家法，易安之‘别是一家’，历东坡、稼轩之变化，以还词之似词”的“新宋四家词说”（施议对、肖士娟《新宋四家词说》，《词学》2010年第1期）。

深稳于虚灵，先悟其起结过变之空灵，而后精神往来，恹恹自得，养空而游，如香着纸。”在与朱祖谋的另一封信中又云“词韵旧谱，但取古谱，不以部别。历观耆卿、美成泊姜、吴两家词中，所押韵脚，冥若符合，确有佳证。”^①与张尔田书中亦说“入声字例，发自鄙人，征诸柳、周、吴、姜四家，冥若符合”^②，再次申述“宋四家”的词史地位。

无独有偶，陈锐《词比自序》（1911）云“大抵词自五季以降，以耆卿为先圣，美成为先师。白石道人崛起南渡之余，明心见性，居然成佛作祖；而四明吴君特以其轶才，贯串百氏，蔚为大宗，令人有观止之叹。”《词比》之撰述，旨在“以此为初级教材书”^③，故其对“宋四家”门径意识的表述更加清晰。光绪十九年（1893），陈锐中举人，需次江南，与大鹤唱和颇多，两人互为知己，彼此推崇。大鹤致信陈锐，说他阅读《抱碧斋词话》时“感君真知，实异世士之延誉增重者。且独于下走论及品格，益叹数十年来朋契之深微无以逾是”，直言“毕生荷一知己，可以无憾矣”。令大鹤感动的是，前者指陈锐评其词“意境格趣，殆不仅冠绝本朝而已”，后者指陈锐《词话》评近人十五家词一则，唯赞过大鹤人品，云其“与白石为近”。除此之外，陈锐“回忆吴会旧游”，甚至说与大鹤“有死生契阔之感”^④。而二人唱和联句、书信交流时所关注的词人，正聚焦于柳、周、姜、吴四家。如陈锐《竹马子》（冷讯通芦）词序回忆的“甲午应试都堂，曾与张子馥、郑叔问联句和柳七词”，《惜红衣》（短巷冲霜）词序记载“白石此词‘日’字非韵也。叔问独以为当叶，姑徇其说”^⑤，以及大鹤《瑞龙吟》（西桥路）词序中所说的“抱碧先生和清真是阍见示，怀古伤春，高健处不减耆卿风格，继声报之”^⑥，陈锐和清真词韵却有耆卿风格，说明大鹤谙熟陈锐词趣。

从词史来看，因之前浙西派尊白石，常州派赏清真，加之清末梦窗词风兴盛，故柳永成为两人共同关注的对象就十分关键。对此，郑、陈之间有过一次“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文字交流。大鹤《与陈锐论词书》述及近来推尊柳永词，先是冯煦“扬波于前”，继而“又得君推波于后”，肯定了陈锐的功劳。然而，他接着说“下走自去春奉教于君子，沉毅以求之，为岁已积，百读不厌，极意玩索，自谓近学稍稍有获”，“复取曩所斲定私辑柳词之深美者，精选三十余解”，“确有层折如画龙点睛，神观飞越”之妙，既强调请教陈锐之后的冥搜之力，又刻意交代了求教之前自己对柳永词投注的精力及非凡的领悟能力，足见他在推尊柳永词上的自信。与大鹤此番话里有话的表述类似，陈锐《抱碧斋词话》在节录大鹤此信之前小序中，称许大鹤“虚衷服善，于余发明柳词，尤引为同志”，继而在节录之后补充说道“观此，则其自负可知也”^⑦，实已读懂了大鹤的心思。由郑、陈二人彼此尊重、相互接纳又各抒己见的交往过程，可基本判断出两人崇尚柳、周、姜、吴四家，绝非“不约而同”之举。尤其是从陈锐《抱碧斋词话》对“宋四家”并无清晰之论，到《词比》中逻辑严密地予以揭示，当有受到大鹤影响的可能。

郑、陈崇柳、周、姜、吴四家词说，得到了蔡桢的承传。蔡桢自述学词历程云，始则于民国二年（1913）识陈锐于武陵，“因稍谙词之源流正变，乃渐习倚声”，继而“乙卯（1915），值大鹤山人于海上，闻其论宫调之理，及读所为乐府，益恍然于词之必求协律”，后又请益况周颐等。蔡桢论词确有兼收并蓄的特点，然陈、郑乃引其登堂入室者，崇柳、周、姜、吴四家词也是他词学门径的基本骨架。他继大鹤《词源斲律》而撰《词源疏证》时即云，“玉田论词，独于白石无间。他如论美成则薄其软

① 郑文焯《与朱祖谋书》，孙克强、杨传庆辑校《大鹤山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284页。

② 郑文焯《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20页。

③ 陈锐《词比》，张璋等编纂《历代词话续编》，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上册，第141页。

④ 陈锐《抱碧斋词话》，邓辅纶、陈锐《白香亭诗集·抱碧斋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70、169、163页。

⑤ 陈锐《抱碧斋词》，《白香亭诗集·抱碧斋集》，第134、136页。

⑥ 郑文焯《樵风乐府》，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0册。

⑦ 《抱碧斋词话》，《白香亭诗集·抱碧斋集》，第170—171页。

媚，论梦窗则病其质实，稼轩则以豪迈见黜，耆卿则以风月贻讥”^①，张炎未能正确对待的这数位词人正是大鹤所看重的。后来他在《柯亭词论》中谈到宋代慢词时又说“自屯田出而词法立，清真出而词法密……梅溪梦窗，远绍清真；碧山玉田，近宗白石。词法之密，均臻绝顶。”^②对于柳、周、姜、吴四家，陈锐《词比序》分别以“先圣”“先师”“成佛”及“大宗”冠之，蔡桢依次以“法立”“法密”“近宗”“远绍”等词称之，承传脉络毋庸置疑。

与蔡桢年纪相仿的陈匪石，“远承张惠言、周济之绪论”，近受大鹤等人“熏陶”，于是论词“欲以南宋之面、北宋之骨，融合为一”^③。他在承认周济“以周、辛、王、吴为不祧之宗”之后，接着便批评周济“降白石为稼轩附庸”以及“不知屯田词品”等错误，对周济“宋四家”学词门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论梦窗词亦如大鹤，认为后人“辄袭取乐笑翁语，亦为质实而不疏快，不亦谬乎”^④，称许大鹤关于柳永词“骨气”“高健”之论“深得词三昧”^⑤，给予柳、姜词“独树一帜”的词史位置，皆当与大鹤的“熏陶”有关。

研究者曾注意到大鹤品评词家集中在“慢词五家”的现象^⑥，但据上文梳理，从大鹤“来哲之楷素，乐祖之渊源”之定位，以及与大鹤深交的陈锐和受到大鹤、陈锐影响的蔡桢、陈匪石等人的词学主张来看，“周、柳、姜、吴为两宋词坛巨子”的“慢曲宋四家”说更为突出。今人黄雅莉曾以柳、周、姜、吴为中心，探究宋词雅化的历程，然未睹作者回应大鹤等人“宋四家”词说的话题。不过，作者认为在宋词史上，这“四人创作倾向的相同，皆为‘词人之词’，且表现为一脉相承的关系”^⑦，结合大鹤“移情致之赏于风骨”的词学审美趣味^⑧，当可为其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二 大鹤“宋四家”词籍批校及推尊意识

大鹤治词精声律，善批评，亦擅校雠。可以说，词籍批校既是大鹤治词内容的一部分，也是他词学造诣攀升及词学思想演进的沃土。其批校的词籍今存或见于引录的有数十种之多，而用力最勤的正是柳、周、姜、吴四家。大鹤对词学门径的探寻历经数个阶段，“为词实自丙戌岁（1886）始，入手即爱白石骚雅”；接着“勤学十年，乃悟清真之高妙”；“进求《花间》，所“制令曲往往似张舍人（引者按：指张泌），其哀艳不数小晏风流”；继而“学文英之秾，患在无气”的道理，以此示“后学所厚诫”（《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21页）；与此同时，“专意学柳之疏鼻，周之高健”，“虽神韵骨气，不能遽得其妙处，尚不失白石之清空骚雅”，但这是“取法固宜语上”的门径，“词家流别，亦于是定”（《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57页）。

大鹤批校《白石道人歌曲》最早，据批校《白石道人歌曲》清乾隆陆钟辉刻本（嘉兴图书馆藏）“光绪辛巳岁（1881）中春”落款，在他自言“为词实自丙戌岁始”之前已着手于词籍校勘，而“入手即爱白石骚雅”亦有批校词籍这个前提。除了此“陆刻本”，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始校乾隆写本《白石道人集》，宣统元年（1909）始校清乾隆张奕枢初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并《补遗》一卷，以及“壬子（1912）孟冬”仍在校勘的另一种“陆刻本”《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并《别

① 蔡桢《词源疏证》，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4、1页。

② 蔡桢《柯亭词论》，《历代词话续编》，上册，第652页。

③ 李敦勤《倦鹤近体乐府跋》，陈匪石著，刘梦芙校《陈匪石先生遗稿》，黄山书社2012年版，第110页。

④ 陈匪石《旧时月色斋词谭》，钟振振校点《宋词举（外三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15页。

⑤ 陈匪石《宋词举》，《宋词举（外三种）》，第144页。

⑥ 参见杨传庆《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⑦ 黄雅莉《宋词雅化的发展与嬗变：以柳、周、姜、吴为探究中心》，台湾文津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⑧ 参见杨柏岭《郑文焯词的艺术风貌及其词史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集》一卷。批校《清真集》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①，首部《大鹤山人校刊〈清真集〉》二卷附《校后录要》完成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实刊于宣统三年（1911）。除此之外，还有《片玉词》批校本、《清真集》批校本（刘崇德藏）、《石芝西堪校订清真词》手稿本（国家图书馆藏）、《清真集》批校本（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括庵过录本）等四种。括庵过录本落款时间从“光绪戊戌（1898）之年十月朔日”到“丙辰（1916）冬中记于沪上”，近二十年“校美成词凡卅余过”^②。批校《乐章集》，以金陵吴重熹石莲庵刻本初印本为底本，从“己亥（1899）之岁中春校过”至“辛亥（1911）夏五”，约十二年。批校《梦窗词》除了较早的以杜文澜刻本为底本的批校本（范景中藏）、现已不知藏于何处的嘉业堂藏手稿本，还有“壬寅（1902）十月”始校，以王鹏运、朱祖谋合校本《梦窗甲乙丙丁稿》为底本的再校本，持续至“辛亥闰六月”（参见《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第91—102页）。

大鹤在词籍校勘上付出了很多的辛劳，如“校《清真词》，每夜深呼灯数起，泚豪累年不倦”，但他诙谐地说，那种“既使此心到实劈劈地，却又须从活泼泼地发想”，实证与玄想结合有如神助的体验，“非参西人灵学不辨”（《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67页）。基于丰富的校勘经验，大鹤表达了对词籍校勘的独特认识，并形成了自己批校结合的词籍校勘特点。如在底本选择上，“依据奉为旧本足征之文”，而后“合诸选本反复细勘”，以“示存古”^③为目标。在校勘方法上，他在王鹏运主张“校词有与他书异”（《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77页）的基础上，针对清代校经习惯所产生的影响，强化了“校词与校经有异，以有声调韵律可寻绎而得者”以及“齐以声律”的意识，发挥其知音律的专长。在校勘态度上，通过“必资于多闻，集思乃所以广益”（《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92、113、117页），避免“以阙疑载疑”，践行“合训诂、考据、词章三者会于心而验之目，乃可以从事以义理为断”（《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87页）的校勘原则。

由上可见，揭示词学门径是大鹤校勘词籍的重要目的。检视大鹤词籍的校勘批语，柳、周、姜、吴四家因系主要校勘对象，出现频率最高，且其品评中“柳周”“周吴”“姜吴”等显豁的对举思路，无不印证其推尊“宋四家”词说的显豁态度。其中，《〈乐章集〉批语》六十四则（依据《大鹤山人词话》，下同），言柳必说周、说周必言柳的现象甚为突出（约十五则），其余涉及苏轼、姜夔、吴文英等各数则。《清真集》批语四十五则，柳永六则，且品评尤重周、柳一脉相承之意。因其批校过方千里、杨泽民《和清真词》及陈允平《西麓继周集》，故时有论及三人之处。余则多将周与姜、吴等联系起来分析，而苏轼只一则。至于《〈白石道人歌曲〉批语》，涉及的主要是吴、周，余则张镃、张炎、周密、王沂孙等各一二处。《梦窗词》批语，提及最多的是周邦彦，其次是姜夔、柳永，余则周密、陆游、张炎、蒋捷、王沂孙等各数处。

大鹤自评词中提及的词人，除了同时代的王鹏运、朱祖谋、宋育仁、吴昌绶、易顺鼎等，前代词人中依次是吴（六处）、周（三处）、姜（二处）、柳（一处），另《花间集》、张先、苏轼、史达祖等各一处。他在评点中更是将“宋四家”作为主要的推尊对象，如“近索词境于耆卿、清真清空雄浑之间，益叹此诣精微”，“盖倚声能事，不求之于北宋，无由见骨气；不求之于南宋数大家（如白石、梦窗、梅溪），亦患无情韵”^④等，可见其学习的门径意识。同时，在与友朋论词书中，如说朱祖谋“骀骀入石帚（引者按：此指白石，下同）之室”（《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75页），夏敬观“深得清真浑茂之旨”，而他自己“近制两解，觉结处微得周、柳掉入苍茫之概”等，所持词学门

① 参见吴熊和《郑文焯批校梦窗词》，《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8页。

② 刘崇德、李俊勇《词学的宝藏：郑文焯批校本〈清真集〉再现人间》，《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③ 郑文焯《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13、120页。

④ 《樵风乐府》稿本自评语，《大鹤山人词话》，第209页。

径还是重在“宋四家”。至于对同道中人关注“宋四家”而有灼见处（如夏敬观“于周、柳、吴诸名词，精斟数条，皆能抉择窾要，洞见症结”），则“极为心折”^①。

历来评析大鹤词学追求，亦多以“宋四家”为参照。光绪十四年（1888）张祥龄云“若孔门而用词，则姜夔升堂，清真入室，君特、张炎童冠之数，君与数子且高揖于尊俎之间矣。”^②所排座次，除了柳永词义乃大鹤晚年悟得，可见其以姜、周、吴等为楷模，已被时人获知。光绪二十年（1894）陈锐云其“掩周、姜而孤上”^③，光绪二十二年沈瑞琳云其“令曲比诸《花间》，其慢词亦不亚片玉、石帚”^④，皆不背离大鹤“宋四家”范围。后来，龙榆生概述云“文焯既留心于乐律，故其词亦偏尚周、姜。两宋词人，号知音，能自制曲者，惟柳永、周邦彦、姜夔，最为大家”“晚乃兼涉梦窗，以上追清真。”^⑤落点未能跳出周济“宋四家词筏”的思维框架，但基本揭示出大鹤的词学历程，强调了大鹤以柳、周、姜、吴为骨架的词学门径意识。

三 大鹤“宋四家”词评与词学旨趣的彰显

大鹤“宋四家”词说的相关表述，不像周济“宋四家词筏”那样，通过清晰的逻辑关系彰显其词学门径的步骤和程序。其中，像“清真为词圣，姜、吴墨守，入室夹辅”之言，似有层次，但这主要是从“解音节谱字”“精审律谱”等角度说的，且明言“皆吾论乐之诤友导师，不可偏废也”（《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83页）。以下大体按大鹤对“宋四家”相对集中关注的时间段依次分析。

（一）“入手即爱白石骚雅”与大鹤词学的艺术底色

大鹤学词“入手即爱白石骚雅”，《瘦碧词》即源于白石词集取名义例；光绪十一年至十二年间（1885—1886）举词社于吴，“即专以连句和姜词为课程”（《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18页）；批校《白石词》更是贯穿其治词的全过程。大鹤如此喜爱白石，一是对其人格、才情的敬仰，“余生平慕尧章之为人，疏古冲淡，有晋、宋间风；又能深于礼乐，以敷文博古自娱”；二是对其志向的认同，“白石一布衣，才不为时求，心不与物竞，独以歌曲声江湖”，“知几，故言能见道，吾是以有取焉”；三是对其词学成就的钦佩，“白石以沉忧善歌之士，振响于南渡之际，进议大乐，志在复古，而道不行”，故而既悲姜夔之遇，且“复志其志，学其学”^⑥。

姜夔人格及词学造诣，对大鹤词学旨趣的影响巨大。其一，启发大鹤转变其治词态度。大鹤早年不喜填词，然在“以敷文博古自娱”的姜夔那里，发现了“当时名公硕儒，贤之遇之者既众且笃”的存在感。虽说姜夔《文苑》《隐逸》两传无载，“仅于《乐志》存其所议，比于伶伦”，但“迄今数百年，仅仅以词显者，孰谓一艺之微不当名哉”。进而，由姜夔其遇其志其学，洞察出词虽“文小而声哀者易于感人”（《瘦碧词自叙》，《大鹤山人词话》，第315页），具有根源于诗骚之义的价值。其二，在大鹤词乐研究上具有典范性。词乐研究是大鹤治词的重中之重，他由张炎《词源》溯源古乐，然其燕乐考证主要通过白石旁谱，“凡七校订乃尽得之，具有显证”^⑦，由此获得洞悉词乐之本的自信。姜

① 郑文焯《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45、55、54页。

② 张祥龄《瘦碧词序》，《大鹤山人词话》，第439页。

③ 陈锐《冷红词序》，《大鹤山人词话》，第440页。

④ 沈瑞琳《冷红词序》，《大鹤山人词话》，第441页。

⑤ 龙榆生《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页。

⑥ 郑文焯《瘦碧词自叙》，《大鹤山人词话》，第315—316页。

⑦ 郑文焯《词源斟律》，《大鹤山人词话》，第381—382页。

夔自制曲旁记音拍，薪传久失，然大鹤“能以意通之，洵可谓悬解之士矣”^①。其三，对大鹤所构筑的“清雅”词学观具有示范意义。在大鹤看来，姜夔词“骚雅原于高淡，如孤云野鹤，养空而游”，在南渡士大夫的一片“凄异之音”中，唯独他能“幽寒自逸，其所作一如其人之髻洁”，“超逸纯粹”，词风更是无人能比^②。正因为对姜夔人格、词风及音律素养的高度认可，才会有“靡曼之音，可决非道人之作”以及“以白石审音精密，诂蒙落韵之讥邪”^③的判断。至此，我们从大鹤貌似知人论世的批评中，读出了以想象中的白石词呵护其理想的词心，在印证其早年接受浙西词学旨趣的同时，更彰显其个性化的审美选择。姜夔词趣堪为大鹤词学主张的底色。

（二）“悟清真之高妙”与大鹤词学“引浙入常”之趣

继专攻姜夔词之后，大鹤“勤学十年，乃悟清真之高妙”。在此问题上，自谭献始，论者多认为他秉承周济的词学衣钵，填词“善学清真”。其实，他早就以“吾斯未信”（《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21页）做出回应。其中固然有“极意追摹清真，苦不得其深秀之致”（《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49页）的愧意，但根本上还是源于他对周邦彦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

在文学史上，周邦彦遭遇过李师师唱其词而为之解褐的讥讽，大鹤曾据史传，试作解释。只是当他思考人们讥讽周邦彦的原因时，发现周邦彦并未能摆脱“当时好名之心，甚于好学”的风气，致使其一生“既误于在官，而得词名，又以少无羁检，老而谪居”，“至令天下词人为之短气，徒以诲淫伤绮滋后世不肖之口，岂不悲哉”。虽说大鹤对周邦彦抱以“同情的了解”，但与其真正心仪的对象，那个“淡泊鸣高，终身不仕”的姜夔相比，“其志趣之清浊，为何如也”（《成肇麈〈唐五代词选〉批语》卷尾附记，《大鹤山人词话》，第14页）。不仅如此，大鹤以承传“古音”为己任，其《词源斟律》便以阐释张炎《词源》卷一内容为主，为何如此，乃因“自古音谱失图，所可见只《词源》一书耳”（《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19页）。如若追责，周邦彦提举大晟，虽在慢曲发展上有“变调綦繁，美且备已”之功，但同时也带来“音拍渐密，古节陵替，词义纷繁，声文不能尽合”（《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20页）的弊端。

那么，大鹤所“悟清真之高妙”又在何处呢？学界多认可他在致朱祖谋的书信中的回答“毕竟当以清真为集大成者。词虽小道，岂易言哉。监以两宋之间，用能文质并茂，空前绝后，兼以才力独雄，蔚为词圣。”于是，学者们便认为大鹤完全认同常州词派如周济视清真词为学词门径逻辑终点的判断。其实，大鹤说这段话，乃是针对陈锐过于重视柳永词门径而言的“伯弢甚厌南宋词家雕润一派，亟欲开径自行。昨已取手校《乐章集》去，恐音拍失古，易流轻俗，气过其文，亦是一挠也。”言下之意，在推尊柳永的同时，也要重视清真词的价值。此则除了能补足前文指出的大鹤在柳永词认识上的自信，也可说明陈锐后来将清真词视为“宋四家”之一，或许与大鹤的建议有关。那么，如何理解大鹤所说的词法上“集大成”“兼以才力独雄”而“蔚为词圣”的清真词的高妙呢？值得注意的是大鹤继“蔚为词圣”之后接着说的话“湘绮翁曩以兹事下问，深叹其微妙。”然“观此老所作”的水平，正如同钟嵘《诗品》记载的作诗平平而多自谓能的袁嘏对人说的“须人投（捉）着，不尔便飞去”（《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84—285页）。这除了有王闿运“眼高手低”的意思，还有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大鹤所体会到的“清真之高妙”。其实，大鹤也屡言清真词“雄浑”“高浑”等前人已有之论，但这些显然不是他所悟之“高妙”处。对此，他既明言“近索词境于耆卿、清真清空雄浑之间，益叹此诣精微”^④，又直说“清真词一片神行，运以高健之笔，故举典不嫌复滞”，“盖以

① 王树荣《重刊瘦碧词跋》，《大鹤山人词话》，第439页。

② 参见郑文焯《成肇麈〈唐五代词选〉批语》“卷尾附记”，《大鹤山人词话》，第13页。

③ 郑文焯《〈白石道人歌曲〉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91、95页。

④ 《樵风乐府》稿本，《大鹤山人词话》，第209页。

清空之气行之，只是文之疏处耳”^①。可见，真正令大鹤兴奋的，还是他在“清空”旨趣与清真词“雄浑”刻板印象之间，领悟一种别样的“浑妙”体验，如此才让他“至为心折”（《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57页）。论者论及大鹤融合浙西、常州词学时，多言其由浙转常的一面。从上文分析来看，还有引浙入常、以浙释常的一面，以及以柳永等人词为参照的特点。可见，大鹤所悟清真词之微妙处，同样存在明显的个人审美趣味。

（三）“发明柳三变词义为北宋正宗”与大鹤追求词之本色的意识

朱庸斋说大鹤“为词从姜夔入，自柳永出，先学白石之幽峭，再融和耆卿之淡秀”，形成了“风骨最佳，惜情致稍逊”^②的个性化风格。此论跃出周济“以还清真之浑化”的思维框框，颇得大鹤填词的要领。大鹤何以会风骨、情致并存而尤重风骨，从学人之词的角度说，主要在于他对“白石骚雅”有一种直觉把握的“爱”，对“屯田风格”是一种理性考量的“思”。一方面，他从柳永词虽“流播禁中，托诸歌妓”，然既“见黜于仁宗”又屡遭时人讥讪的经历中，悟出作曲子的贤俊“正未可与朝贵抗声比迹”的社会地位，以及“词客流连风月，固宜胥疏江湖，高逸自持，无怨凉独”^③的人生操守；另一方面，他针对“柳三变乃以专诣名家，而当时转述其俳体，大共非訾，至今学者竞相与咋舌瞠目，不敢复道其一字”^④的不公正评价，经过十余年批校《乐章集》，自信而言“发明柳三变词义为北宋正宗”之奥义。简言之，即人们常共訾多俳体的柳词，其实从声文谐会的词体体制上说，“求之两宋，清真外，微耆卿其谁欤”，甚至“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词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已”（《〈乐章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9、17页）。

其所谓“正”，“要皆出于乐府遗音，实倚声之当行本色”^⑤。这正是他研习词之旧谱，追求弦诵为本的理想之所在。一则，“旧谱”关乎词之正统，而“南渡后乐部放失，古曲坠佚，大半虚谱无辞”，即便“白石补亡，仅数阙尔”，求之两宋，“赖柳集传旧京遗音，亦倚声家所宜研讨者也”（《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43页）。于是，在词籍校勘中，揭示柳永词多存旧谱以及以此为校勘他词的依据，乃其自诩“审音者识之”的重要项目。如周邦彦所填《意难忘》，“此类令曲，惟柳三变具有其体，真北宋遗音”^⑥，评柳永《尾犯》（夜雨滴空阶）曰“以吴文英是词考定字例，悉依柳词无一出入，足征旧语”（《〈乐章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21页），此“旧语”即指“《乐章集》中多存旧谱”之言。二则，声文谐会关乎词之本色，柳永既“以善歌为北宋词家专诣，故所造独精，齐以亢队，流韵红牙”（《刘藏〈清真集〉批校本》封背题识，《大鹤山人词话》，第57页），又“触景生情，直写胸臆，北宋风格，惟柳三变有此白描手段”（《〈清真集〉括庵过录本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80页），如此词家正宗、当行本色的“北宋倚声家妍手”，怎忍非议贬低？至此可以说，在浙西、常州词学影响下的清代词坛，大鹤通过发现柳永词的独特价值，令其回归到探寻歌词本色的道路上，进而掘发柳永“骨气高健，神韵疏宕”（《〈乐章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9页）的特点，深化了其“移情致之赏于风骨”的艺术旨趣。

（四）“君特为词，用隼上之才，别构一格”与大鹤词学开径自行的意义

在词体音律上，大鹤借用锤嵘称许郭璞游仙诗“用隼上之才，变创其体”^⑦之语，评价了“君特为词”，认为恪守词律典范的梦窗，在“拈韵习取古谐”等方面赋予词乐的艺术理想，具有“锤幽凿

① 郑文焯《〈清真集〉括庵过录本》“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78页。

② 朱庸斋《分春馆词话》，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③ 郑文焯《〈乐章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6页。

④ 郑文焯《与陈锐论词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96页。

⑤ 郑文焯《刘藏〈清真集〉批校本》“封背题识”，《大鹤山人词话》，第57页。

⑥ 郑文焯《〈清真集〉括庵过录本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77页。

⑦ 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险，开径自行”的意义。对此，“学者匪造次所能陈其细趣也”，于是他“今加搜校，黜戈砭杜，略复旧观，其所盖阙，以俟宏达”^①，交代自己致力于梦窗词的动因，彰显其治学一贯的反思意识。关于词的入声字律，大鹤自诩有创见，他所举的例子中，除了清真词，便都是“梦窗于入声字律步趋清真，无少出入，其苦心可知，所谓善学者也”（《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35页）。

虽说大鹤参与到清末梦窗词校勘、研判的风气中，但与半塘、彊村等人欣赏梦窗词的“涩”美不同，他本着“词意固宜清空，而举典尤忌冷僻”之论，一度认为“梦窗词高隽处固足矫一时放浪通脱之弊，而晦涩终不免焉”。究其原因，主要是梦窗词“诚务博之过，亦字意用晦之所致也”^②。如此解释，仍然局限于对梦窗词“涩”美的一般分析，这显然不足以让他将梦窗列入“两宋词坛巨子”之列。其实，他对梦窗词“别构一格”的判断，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勇气与自信“至人谓其词为涩体，不知其行气清空，正如朱霞白鹤，飞荡云表。”（《成肇磨〈唐五代词选〉批语》卷尾附记，《大鹤山人词话》，第15页）此处，我们似乎读到了张炎欣赏姜夔词境的意味。

识见如此，再来看梦窗词的“涩”，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字面上，“梦窗虽好炼字，绝无滞迹”（《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48页），如其取字多从李贺诗中来，“故造语奇丽”，然“世士罕寻其原，辄疑太晦，过矣”^③。就美学特质而言，在密丽、艰涩的外表下，其实“清空在骨气，非雕琢薄辞，徒以文掩意也”，不得徒于迹象求之。因此，大鹤极不满意张炎以质实论梦窗词，“素觉玉田‘七宝楼台’之喻犹为目论也”（《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29、117页）。于是，他拟编《梦窗词选》，即“特选其空灵诸作”（《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118页）。可见，大鹤对梦窗词的判断亦类似于对清真词的认识。至此，关于大鹤的词学旨趣，研究者多认为他“将其早年接受浙西词学的‘清空’引入常州词学‘寄托’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空寄托’理论”（《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第443页）。此论不无道理，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大鹤在汲取浙西、常州词学旨趣的同时，对二者词学趣味均有反思，进而更强调“以浙释常”，彰显其“白石骚雅”的论词底色及其“移情致之赏于风骨”的艺术追求。

四 大鹤词学批评史观与“宋四家”词说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注重对写作原则及方法的揭示，像诗话、词话类著述通过评析历代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文艺史观，与原本给予写作指导的门径意识密不可分。由此，可以进一步解读大鹤的“宋四家”词说。

（一）“不可立宗派”的批评原则

大鹤“善批评”，一大表现即是他对词学批评原则及标准的积极思考，而他的相关见解亦聚焦在他对“宋四家”词的阐释中。

其一，反思传统“正变”观，推崇以“体、裁”求真实。中国传统“正变”观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尤重价值判断。印证于词学史，词家源于词学门径的需要，更善于人为设定词学发展的逻辑走向。大鹤亦云“自宋迄今将千年，正声绝，古节陵，变风小雅之遗，骚人比兴之旨，无复起其衰而提倡之者”。不过，他并没有像张惠言那样，将传统正变观引入词史的构建中。因为在他看来“凡为文章，无论词赋诗文，不可立宗派，却不可偃体、裁。”“体、裁”之“体”反映在他对词体源流的认识上：“盖词为乐府之遗，本乎歌谣，极命风骚，出入正变。”后起的词体涉猎广博又变化无定，然而体制上

① 郑文焯《梦窗词跋一》，《大鹤山人词话》，第304页。

② 郑文焯《梦窗词跋二》，《大鹤山人词话》，第305页。

③ 郑文焯《郑批杜文澜曼陀罗华阁刻本〈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19页。

则“飒飒古燕乐之原，其惟此一线哉”。可见，大鹤所言“出入正变”，乃就词之体制是否“纯正”“本色”而言。大鹤追求可为词人师法的类似于“古燕乐之原”的“正音”范型，并不注重在词史转型的道德维度上讨论正变问题。于是他接着说“余旧纂词韵辨例，即据北宋晏、柳、周，南宋吴、姜诸名家韵例”（《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20—221、223页），称许包括“宋四家”在内的诸名家词能遵循弦歌之词的本体之道，强化了“称词体”维度的词史演进的自然历程。

其二，以“文人相轻、相誉”为诫，强调“以风义相切磨（劘）”的向善德性。大鹤明言“文人相轻，自昔而然，走居恒引为厚诫”，且自叙“窃未敢以得之己者妄施诸人，正恐蹈相轻之习”（《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55页），解决因“相轻”而欠正义的现象。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因“文人相誉”而欠公正的问题“吾党同志日希，宜以风义相切磨（劘），幸无为过情之誉。”（《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42页）面对师友的美誉，须十分谨慎。他曾致信朱祖谋，既言朱氏“三复来告，宏奖过情，但有惭悚”（《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55页），又说自己“昨制《迷神引》，先就正瞻园（引者按：指张仲忻），有溢美之誉，未之深信”（《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75页）。何以既不过誉亦不相轻，简言之，即是向善须以求真为前提。大鹤“宋四家”词说可溯源至张炎作词“四字诀”，但他并不赞成张炎“崇四家词”时“黜柳以进史”的做法。因为史词“于律未精细”，而“屯田则宋专家”，柳、史之间的差距“犹唐之诗家，有盛晚之别”（《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19页），理当“黜史而进柳”。大鹤着眼于清末词坛，肯定了冯煦“尊柳”之功，然其分析柳词，又颇多针对冯煦之意。冯煦尊柳，但仍视其“好为俳体，词多媒黜”^①，而这正是大鹤所要重点批评的内容“昔梦华谓‘柳词曲处能直，疏处能密，鼻处能平’，语似近之。今更下一转语，逆推之，便尽其妙致”^②。“逆推之”，如直处能曲等，正是大鹤解读柳永词“细趣”之处。

其三，超越“蔽所希见”“予智自雄”之限，强化审美直觉的尚美之论。大鹤生性不喜官场，这种超然态度，在词学上即体现为一种美学立场。他说“作词尤诫此二弊，一由‘蔽所希见’，一由‘予智自雄’”（《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21—222页），从两个极端批评词人的自我中心主义，获得一种审美直觉能力。对大鹤来说，“疏古冲淡”的姜夔，其人品词境自不必说；吴文英因能“化质实为清空”，字面亦有“无凝滞之迹”（《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57页）的美感。难在主张“清空风骨”的大鹤，如何欣赏“情致缠绵”的柳永词风。为此他说“柳词浑妙深美处，全在景中人，人中意，而往复回应，又能托寄清远，达之眼前，不嫌凌杂。”（《〈乐章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8页）大鹤对柳永词这种灵光一现的解释，受到了项平斋所谓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55页）的启示。至于周邦彦，大鹤很喜欢将他与柳永比较，无论是人生经历、歌词传播效果，还是“其格调之奇高，文采之深美，亦相与颀颀，未易轩轻也”的词学造诣，二人都有相似处。但周邦彦“误于在官”，其词虽“雅”却有欠“真”“贞”之处，而柳永终是流连风月的词客，“怨”中又不失“疏鼻”（《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57页）之真，故而比较之下，大鹤有一种“进柳退周”的倾向。

（二）以词体体制为基准的词史演变观

基于上述原则，大鹤对词史多有评点，尤其是基于“惟此一线”的音乐文学体制特点，描画了千余年词史的发展进程，形成了大鹤较为独特的词史演变观。首先，唐五代词的本色魅力在于传承古音和诗骚传统，浸染着唐诗的丰姿，彰显着传统艺术理想。词为弦诵之体，唐五代词多以曲名为题，延

① 冯煦《蒿庵论词》，《词话丛编》，第4册，第3585页。

② 《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55页。按：正如大鹤所云“语近似之”，其中将冯煦原文“密处能疏”误记为“疏处能密”。

续了“乐府原以曲名为题”(《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20页)之古例。在作品风格上,“唐五代作者,其原出宫体,盖小雅怨诽之义也”,故“怨深文绮,词人本色”(《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90页)。在与唐诗的关系上,“唐人以余力为词,而骨气奇高,文藻温丽”^①。至于对传统艺术精神的彰显,“词家比兴之作,唐、五代为最上”,所以如此,“盖芬芳悱恻之深情,附物宛转,其调哀急,唯宜令拍”,而唐五代正是令曲的全盛时期。对此,大鹤曾有过反思,由于令曲系“徒谣短节,工之至难”,故其早年因艺术功力不足而“多取慢声”,“托寄虽远,贞则易乖”(《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78页)。其言下之意是,前述唐五代比兴艺术等,才是填词“贞则”的体现。

其次,两宋词不及唐五代词,但变中又有不变,代出名家。从词体体制上说,“至两宋始则声文谐会者盖寡”(《郑批杜文澜曼陀罗华阁刻本〈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46页),一是因为慢词渐兴,“比兴”减少,“嬉成流移,文无止泊”的赋笔增多,影响了词的艺术感发力量;二是因为宋代学人专志于此,骛骛入古,然“毕竟不能脱唐、五代之窠臼,其道亦难矣”。由此,大鹤是在两宋不及唐五代这个总趋势中,称赏“宋四家”等诸名家的词学成就。例如,与唐五代词多文质并茂之篇相比,“南北宋则文胜于质”,“然丽藻绮章,时复陈其归趣,二晏、周、秦,其骨气高深处,亦不减韦、薛风流”(《〈花间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3页)。又如,北宋部分词人能直寻所得,触之当前,委曲形容,故而“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典型的即是“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喻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与夏敬观书》,《夏敬观年谱》,第43页)。至于“南宋百五十年中,以词名者百数十人,而所号称知律者亦不过二三名家”^②,此二三名家即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不过,除“知律”外,若南宋诸名家遭遇时艰,所作“多慷慨余哀”,佳作亦能“忠爱溢于词表”,“托寄遥远,极命风谣”(《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88页)。

再次,金元明至清代前中期是词史的衰落期,至清代乾嘉以后,衰中有兴。大鹤直言“金元诸词人之造诣,每况愈下,至不可拟议”(《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83页);元代“以乐府名家者,惟虞集《鸣鹤遗音》、张翥《蜕岩词》最称雅正”,余则“率多放浪通脱之言”^③。“元明以降,益用胸驰臆断,文不雅驯”(《〈白石道人歌曲〉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12页);至清代,“攻朴学者薄词为小道,治古文者又放为郑声”,其中浙西词家“朱、厉雕琢为工,后进驰逐,几欲奴仆命骚矣”。不过,词道衰息,自南宋以来,至清代嘉庆间张惠言“穷讨达学,而词体一尊”,再到清末后三十年,虽说“求其述造渊微,洞明音吕,以契夫意内言外之精义,殆十无二三焉”,但“罔敢乖刺,自蹈下流”(《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20页)的词坛风气业已形成,“作者辈出,骛骛欲度骅骝前”(《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79页)的词人阵容已成规模。因此,大鹤是以“复兴”的眼光来审视清代乾嘉之后的词学。

(三) “由博返约”的词学门径

大鹤早年嗜诗、治小学,以及“研经余日,未尝废文,独于词学,深鄙夷之”。后来专力治词后,早年“务博”的学养令其信心满满,致使其认为“词无学以辅文,则失之黥浅;无文以达意,则失之隐怪,并不足与言词”,像“唐五代及两宋词人,皆文章尔雅,硕宿耆英”就是明证。不过,正如孔子所言“以约失之者,鲜矣”,“务博”是基础,“由博返约”才是方法和目的。大鹤曾专门将此“宣尼论学”之语传授给张尔田,希望他“请进此旨以言词”,如此方能“自镜得失耳”(《与张尔田书》,

① 郑文焯《〈花间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页。

② 郑文焯《与吴昌绶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94页。

③ 郑文焯《蛾术词选跋一》,《大鹤山人词话》,第306页。

《大鹤山人词话》，第221、218、222页）。

此一治学方法反映在词选编辑上，即是在博览众作的基础上，为后世词流“择其菁英”（《与张尔田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18页），指出了词选编辑的功能。他有过多次词选编辑计划，如“谛观宋人集中，清空隽快之制，络绎奔会”，“近选廿余首”（《与朱祖谋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79页），并邮寄给朱祖谋。除此之外，宣统元年秋，针对《乐章集》世无善本的情况，“拟别录一帙，选集中至精绝妙之作三十解，以供简炼”；继而“合周、苏、辛、吴、姜为六家，词选正宗，再选六一、子野、二晏四家小令”；至此，他特作说明云“庶灿然大备，‘以约失之者，鲜矣’”。其中，“六一、子野、二晏四家小令”，原稿为“阳春、六一、二晏、淮海、漱玉六家”，后勾去阳春、淮海、漱玉，补子野^①。因此，这一选本纯为宋词选，共十家。大鹤遗稿中有《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写目，小令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秦观等五家，慢曲为柳永、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吴文英、姜夔、贺铸等七家。比较之前的“宋十家词选”，此选在小令、慢曲中分别增加了秦观和贺铸。

前文已说，“宋十家词选”拟选柳永三十阕，大鹤《与陈锐论词书》又说他之前确实“私辑柳词之深美者，精选三十余解”（《与陈锐论词书》，《大鹤山人词话》，第296页），而“宋十二家词选”写目列出柳永词篇目三十三阕、苏轼词十六阕。同时，其“尝拟精选《梦窗词》”（《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17页）的数目也有“三十首”“廿七首”等说法，据手批《梦窗词》对拟选词作的圈点，实为二十八首（参见《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第48页）。至于其他词人拟选词作数量，未见相关记载。无论原初“晚唐五代宋十二家词选”之构想，修改后的“宋十家词选”，还是“宋十二家词选”的写目，柳、周、吴、姜、苏、辛六家作为慢曲代表的地位始终稳固。或许与大鹤词籍校勘的用力程度有关，“写目”中对前五家词集的版本信息交代最为详细。在此六家中，已知拟选柳、吴词数量亦明显超过苏词，加上大鹤很少评价辛、贺，足见他真正推崇的还是柳、周、姜、吴四家。

与其他词人比较，大鹤评析“宋四家”时，尤重他们的词史地位和影响力。或关注他们在宋代的传播力，如云柳、周“两家名句又皆流播禁中，托诸歌妓，固一时嘉话”（《〈乐章集〉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16页），周词之美“一时盛口，世士真震”^②，“白石以歌曲妙天下，当时词客咸宗之”（《〈白石道人歌曲〉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89页）等。或拓展至时代的影响力，如云“触景生情，直写胸臆，北宋风格，惟柳三变有此白描手段”（《〈清真集〉括庵过录本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80页）等。进而延伸至千年词史之地位，如称赞强焕《清真词序》揭示周词“辉映后光，亦足千古”^③的意义，认为姜夔词“高致亦足千古”（《〈白石道人歌曲〉批语》，《大鹤山人词话》，第87页），梦窗“所为卓绝千古”（《手批梦窗词》，《大鹤山人词话》，第117页）等。诸如此类，可见他倡导“宋四家”之明显态度。但这种倡导，既非“辨正变”，也非纯粹地“立宗派”，而是以“不可偏体、裁”为前提的尊重词人词作艺术特点的推举行为。简言之，周济、大鹤均标举“宋四家”，然而在思维方式上，前者“庶乎由博返约，沿委求原”（《宋词举·凡例》，《宋词举（外三种）》，第3页），后者则是“由博返约，穷源竟委”。由此，我们可更深层地把握大鹤“宋四家”词说的词史价值。

【作者简介】杨柏岭，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出版过专著《龚自珍词笺说》等。

（责任编辑 马昕）

① 参见陶然、姚逸超《乐章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下册，第824—825页。

② 《成肇磨〈唐五代词选〉批语》“卷尾附记”，《大鹤山人词话》，第14页。

③ 郑文焯《刘藏〈清真集〉批校本强焕序》“跋语”，《大鹤山人词话》，第58页。